2021年1月23日 星期六
值班主任：张一强 主编：杨道 美编：张昕 检校：李彪 苏建强
海南日报

史志琼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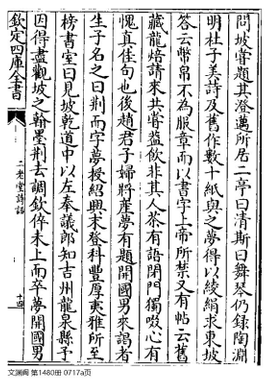
苏东坡与海南人赵梦得：

一双千岁鹤 不作孤翔鸿

■ 李公羽

古代国画中的苏东坡。

苏东坡贬琼三年，北归渡海之前所作的《渡海帖》，近代煊赫于世。与之同时，帖中所指“梦得秘校”也进入世人视野。此“梦得”何许人也？他与苏东坡何等交往？东坡先生北归途中，为何要为其写帖、专以慰藉？其人其事，史载较少，近年所传，多有错讹。笔者探寻梦得行迹，察访梦得与东坡交情出处，可见东坡待人之善、处世之良，并受世人景仰、热爱，同时，亦可见得海南人民淳朴贤良，民风极善。



周必大《记赵梦得事》原文。

《渡海帖》载苏东坡赵梦得深厚交情

元符三年（1100），苏东坡获赦北归，由儋州量移廉州安置，途经澄迈县时手写一通尺牍，因其中首句有“轼将渡海”，后世名之《渡海帖》；又因卷尾有“梦得秘校阁下”，书封有“梦得秘校”，故亦称《致梦得秘校尺牍》或《致梦得秘校书》。原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此帖流传记载，曾由明代著名收藏家、鉴赏家，浙江嘉兴人项元汴（1525–1590）收藏，随之被同朝文学家、画家，松江府华亭（今上海市松江区）陈继儒（1558–1639，号眉公）摹刻收入《晚香堂苏帖》。

“梦得秘校”是何方人士？史料单薄，解读各异，说法不一，分别有广西人、儋州人、昌化人、澄迈人等说法。

《苏轼全集校注》卷六十载有《与姪孙元老四首》，均为东坡先生居儋所书。其第四简说：“赵先辈儋人，此中凡百可问而知也。”

王文诰《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》有注：“赵梦得乃举进士者，故称先辈，盖以儋人流寓澄迈者也。”此论欠实。因为宋时海南举进士者人数屈指可数，赵梦得不在其列；“儋人”之说，也不准确，另有原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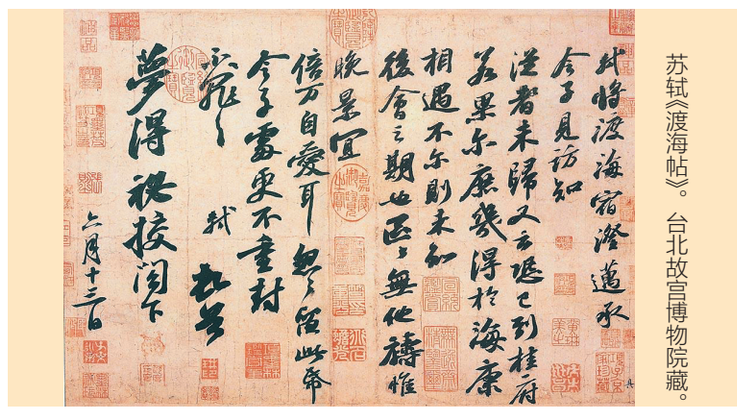
张志烈《苏轼年谱》考：“苏轼所生活之时代，‘先辈’意为晚辈”。十数年后，张志烈在《苏轼文集校注》中又指出：“赵先辈：即赵梦得。”

其实，古人有随子女称呼亲眷的习俗。所谓“赵先辈”，如同今日所说“你的赵叔叔”，是相同的，只是因为书简接收对象惟一，“你的”二字，随语境省略了。

南宋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周必大（1126–1204）在《二老堂诗话》中有《记赵梦得事》。记有：“广西有赵梦得，处于海上。”近有论者，认定赵梦得乃广西人，依据即此。其实，北宋后期，海南隶属广南西路。对于原籍郑州、生于苏州的作者周必大来说，凡广南西路所属，包括海南人，包括澄迈人，均系广西人。

王文诰《总案》注为，赵梦得“盖以儋人流寓澄迈者也。”认定赵为“儋人”，大致多为东坡曾明言“赵先辈儋人”的沿用所致。

《正德琼台志》卷三十八“人物”载有“赵荆”条：“字道授，昌化人。”荆为梦得之孙，所谓“昌化人”，也应是上述“儋人”所致，时儋州名“昌化军”。



苏轼《渡海帖》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。

当年澄迈县城，即今之老城镇。赵梦得家境殷实，院大庭深，中有二亭。东坡北归时，其子专往通潮驿拜见东坡。可见，赵梦得之家当在澄迈，且应居城中，距东坡所寓通潮驿仅数里之路。梦得虽时常北上，但他儿子居澄迈。可见，澄迈至少是赵梦得常居之地。王文诰《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》在元符元年（1098）年末时也记有：“赵梦得自澄迈来见。”

苏东坡与赵梦得常作鸣鹤之应

赵梦得，凡官修正史，均无记载。东坡与赵梦得相互函简，凡史志文集亦多不录。这是近千年来于赵梦得少有考论之源。

东坡《渡海帖》中所称“梦得秘校”，是留给世人的一个追寻线索。

秘校，古官职名。后魏时朝廷秘书省，置校书郎，简称“秘校”，校勘典籍，收藏抄录等。唐时秘书省与弘文馆皆置秘校，宋时秘校仍属秘书省。清时梁章鉅《称谓录·进士》中说：“《却扫编》进士登科人，初官多授试秘书省校书郎，故至今新擢第人犹称秘校。”

苏东坡携苏过一行于绍圣四年（1097）农历六月十一日晨自徐闻递角场登舟渡海，入夜抵海南岛澄迈县城西门外，宿通潮驿。次日径往琼州府城报到，办理公文，数日后返程，再经澄迈逗留，并至赵宅相聚。

东坡曾以大字书写“赵”字赠送，并亲至澄迈县赵宅大院，为其二亭题名，曰“清斯”，曰“舞琴”。

“清斯”，出自《孟子》卷七《离娄章句》（上）：“有孺子歌曰：‘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’孔子曰：‘小子听之！清斯濯缨，浊斯濯足矣，自取之也。’”如果遇到清澈之水，可以洗我的帽缨；如果遇到混浊的水，也可以洗我的两脚。尽在于自己的选择取舍。“清斯”二字，含意非凡，既有对梦得秘校的期盼与祝福，也饱含东坡自己的社会人生经验和感悟。

“舞琴”，出自五代时文学家、法医学家和凝，其《三乐达节》中有“先生自舞琴”，历史厚重、文脉博大、含意极深。东坡信笔一挥，古韵悠长。

《苏轼文集》收录一件与赵梦得帖：“旧藏龙焙，请来共尝，盖饮非其人茶有语，闭门独啜心有愧。”龙焙，造御茶之官焙曰龙焙，旧时指代建安名茶。东坡自中原千里迢迢带至儋州，数量应不会多。珍品珍藏，而且远在“非人所居”的荒蛮之地，东坡亲书手札，约聚品茶，何等礼遇。更为难得的是，东坡不能直接赠送诗作，以免枉生祸端，因而用心作了一个文字游戏：在普通的约会手札中，隐含一联诗句：“饮非其人茶有语，闭门独啜心有愧。”巧妙形式，饱含真诚心意：珍藏多年的极品好茶，如不是适饮之人，茶也会有怨言；如果自己闭门独享，我也会心生愧疚。

周必大《跋东坡与赵梦得帖》记述：东坡“特畏祸，不欲赋诗，故录陶杜篇并旧作，累数十纸以寓意。”《二老堂诗话》中又记有：“仍录陶渊明、杜子美诗，及旧作数十纸与之。”东坡戴罪之身，时值朝廷严查并强令焚毁东坡文稿、书板之际，不便写诗赠送，便将自己书写的数十件陶、杜诗作，以及自己旧时作品，赠送赵梦得。这在东坡一生，实不多见，不仅慷慨，更在诚意。

赵梦得也并不客气，再出示一幅绫绢，希望东坡书写，以示珍重与收藏。东坡则直爽作答：“币帛不为服章，而以书字，上帝所禁。”币帛之类，不用于衣服穿着，而用于书写，上帝也不允许。这一场简朴而盛情的邀约，已入史册。

品行超凡的“南海义士”赵梦得

周必大《省斋文稿》卷十六《跋东坡与赵梦得帖》，开篇即为：“南海上有义士曰赵梦得。方苏文忠公谪居时，肯为致中州家问，其贤可知。”《省斋文稿》流传不广，《跋东坡与赵梦得帖》虽《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》节选，也罕有论者提及，因而史有记载的“南海义士”亦鲜有人知。

中州，河南古称，又名中土，中原，因位于古时九州之中而名。北宋京都在开封。

王文诰《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》记：赵梦得“此两年中，又尝自京往回见元老，则京、蜀、许常家问，无不达矣。其所得手迹，至累数十纸之多，则自澄而儋，来去不常，时一过可知。”赵梦得为慰问分散多地的东坡子孙，奔走开封、成都、许州等地，逐一看望，没有不到的地方。

孔凡礼所记“梦得（或其子）亦为苏轼致书许州”，即是为东坡先生带家书给时在许州的次子苏迨。

“百药煎”，中药名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有载。东坡书简中嘱元老：乡村中采出的百药煎，如能收得，可寄二三斤，你的“赵先辈”叔叔回海南时，可请他带来给我。

赵梦得这些举动，当属不易。时为元符年间，正值宰相章惇横行无忌，除严令打压东坡等元祐老臣之外，还高立赏格，大兴告密，法令诛罚，人人自危，环境极度艰恶。东坡曾因“特畏祸，不欲赋诗”，赵心知肚明。即入京师，虎狼之势，然而赵一如既往，“肯为致中州家问”，多处寻访，奔走探视、抚慰东坡之子孙。守义不苟，品行超凡，慷慨乐助，情操高尚，当真可谓贤达，当真可谓“义士”。

笔砚清玩

《隐居十六观之十五·缥香》

《隐居十六观》作于1651 年，是明代画家陈洪绶（号老莲）逝世前一年的作品，是16 帧表现隐居生活的白描人物画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16 幅各有用典，当中援引了庄子、刘辰翁、苏轼、陶渊明、班孟、宗炳、孙楚、魏野、李白、鱼玄机等人的事迹。其中固有借古人以点题，又似有老莲真实生活经历之写照。借画写意，以寄幽情。人物造型略有夸张，衣纹细劲流畅，富有装饰味。全画创意新颖，构图简洁，设色淡雅，近似白描。为陈洪绶人物故事画精品。

陈洪绶（1599～1652），浙江绍兴人。明末清初书画家、诗人。年少师事刘宗周，补生员，后乡试不中，崇祯年间召入内廷供奉。明亡入云门寺为僧，后还俗，以卖画为生，死因说法不一。一生以画见长，尤工人物画。其人物画成就，人谓“力量气局，超拔磊落，在仇（英）、唐（寅）之上，盖明三百年无此笔墨”；当代国际学者推尊他为“代表十七世纪出现许多有彻底的个人独特风格艺术家之中的第一人”。

陈洪绶去世后，其画艺画技为后学所师承，堪称一代宗师，名作《九歌图》（含《屈子行吟图》）、《<西厢记>插图》等版刻传世，工诗善书，有《宝纶堂集》。

（杨道 辑）

读史侧翼

韩愈的家国情怀

■ 程应峰

韩愈之所以被后人尊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，一是因为文章写得好，二是因为他颇具家国情怀。

韩愈的家国情怀，一句话说，就是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情怀。韩愈拥有典型的君子人格，注重个人知识修养和道德修为，他操行纯正，目标坚定，谈文论道直爽坦率，从不畏惧或回避什么。在倡导古文革新运动中，他不错过任何可以宣传自己散文革新主张的机会，可谓殚精竭虑，全力以赴。他有一颗平等仁爱之心，与人交往，无论对方发迹或是潦倒，他都坦诚相待、倾心相对。他善于诱导勉励后进，只要一心向学入了他的门舍，他都会以宾客之礼相待，时刻不忘以身作则，时刻不忘以振兴名声教化、弘扬仁义为己任。

韩愈胸怀江山社稷，忧国忧民。公元803年，时任监察御史的韩愈，负责查访关中地区旱情，他目睹灾民流离失所，四处乞讨，饿殍遍地，自是痛心不已。而当时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，谎报关中粮食丰收，百姓安居乐业。韩愈在愤懑之余，向朝廷上奏《论天旱人饥状》疏。面对他的实言上疏，李实等人不乐意了，他们群起攻之，谗言相害，就这样，韩愈被贬为一偏远荒地的县令。

此后经历了几起几落，韩愈写下《进学解》自喻。宰相李吉甫读过后，认为他史学才识超群，于是极力推荐韩愈为史馆修撰。虽然韩愈才识丰厚，忠心可鉴，但因他一向豁达率真，心直口快，粗疏之处难免，还是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起落于重用与被贬的轮回里。

韩愈坚持真理，大胆谏言，勇于改革。他敢于讲话，且敢讲真话，他的谏言有内容、有深度、有力量，用语独到，气势磅礴，不同凡响。《论佛骨表》中，他说：“群臣不言其非，御史不举其失。”认为供奉佛骨实在荒唐，要求将佛骨烧毁，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。宪宗为此非常生气，要用极刑处死韩愈，裴度、崔群等人极力劝谏，众多皇亲国戚也认为对韩愈加罪太重，为其说情，宪宗便将他贬为潮州刺史。韩愈被贬后，写下“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阳路八千，欲为圣明除弊事，肯将衰朽惜残年”的诗句，表达了自己忠心进谏、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。

韩愈尊儒却不墨守。在《读墨子》一文中说：“孔子必用墨子，墨子必用孔子，不相用不足为孔墨。”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。对于这样的言论，有人指为“刺谬”。对于世俗之见，他更是不以为然。《师说》一文，他得出“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”的结论，揭示“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”的道理，可谓勇气鼎沸，胆识过人。

忧心为国，忠诚执着，敢于承担，这就是具有君子人格的韩愈。白居易说韩愈“不交势利，自致名望。”这名望，于韩愈而言，有来自文字的成分，有来自人格的成分，更令人钦仰的，是他有一份无以言表的、炽热浓厚的家国情怀。

史鉴典录

古人的垃圾管理

■ 何小琼

从2020年开始，关于如何丢垃圾的问题就成为了大家高度关注的焦点，如今临近年关，家家都需要大规模地洒扫拂尘，垃圾的处理问题又一次成为朋友圈中的热点话题。

古人有没有垃圾管理？史料有载，早在商代，各行各业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，生活生产垃圾数量可想而知。当时，对垃圾管理是非常严格的，甚至可以说到了残酷地步。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上》写道：“殷之法，弃灰于道者断其手。”灰，就是垃圾，如果居民把垃圾随意倒到街道上，一旦被抓住，是不问情由，一律受断手的惩罚。处罚之严厉，自然收效极好，为了一堆垃圾被断手，毕竟是得不偿失的事情。可见，残酷处罚之下，就有了警示作用。

这种严酷的惩罚一直沿用，但在收效甚大的同时，也让民间怨声载道。到了秦朝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《汉书·五行志》上写道：“秦连相坐之法，弃灰于道者黥”。黥就是在脸上刺上记号，并且抹上擦不掉的墨水。这样的处罚和断手相比，似乎轻了，至少手还在，但脸上的记号就成了耻辱。走到哪儿都是一个典范，看，这就是乱丢垃圾的下场。这个方法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，但也让人同时心生畏惧。

到了周朝，随着城市日益发展壮大，相连的“环保机构”和“公共厕所”也应运而生。最早的史书记载着专门的清扫机构是《周礼·来官》，书中写道：“狼氏下兵六人，胥六人，徒六十人。”这些人，就是负责清扫城市街道，保持整洁，也就相当于现代的环卫工人。不过，当时的规章制度比现在更严格。而在周朝出现的“公共厕所”，也有着严格规定，并且设有专门的管理部门，如果管理不力，导致恶果，将受到与扔垃圾者同样的处罚。这样，谁敢不尽其责？谁敢以身试法？

到了盛唐时，城市的繁华可想而知。对垃圾管理更是严格。据《唐律疏议》中写道：“其穿垣出秽污者，杖六十；出水者，勿论。主司不禁，与同罪。疏议曰：“具有穿穴垣墙，以出秽污之手于街巷，杖六十。直出水者，无罪，主司不禁，与同罪……”由此可见，管理不当，街道卫生受到污染，不但当事者受罪，管理者也难逃其职，两样领罚。这样，被罚者一生铭记，管理者再也不敢坐其职不尽其责。

时光荏苒，从古至今还有许多关于城市垃圾管理的事例。虽然许多方法看起来匪夷所思，但强制执行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。我们只有提高环境保护的意识，才可以创造真正美好的家园。

学林一叶

中国早期的文学史意识

■ 徐志啸

一般认为，文学史意识的产生，始自欧洲，随后是日本，日本系受欧洲影响而生；而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文本，乃问世于19世纪末的欧洲（德国），继而，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出版了多部中国文学史。对此，学界一般无异议。但港台学者黄维梁等曾提出，中国在南北朝时期已产生了文学史的早期短篇文本——刘勰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。笔者认为，这一观点有道理（主张这个观点的，还包括其他一些学者，但黄的观点最鲜明）。应该承认，中国本土在南北朝时期，已有了文学史的早期短篇文本，不过，笔者所要特别阐述的是，不光是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中的《时序》篇，且其《文心雕龙》其他篇章也多处涉及了文学史，还有，与刘勰时代相近的沈约、萧子显、萧统等，也在他们的论著中，涉猎或表现了文学史意识。故而笔者认为，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已具有了明显的早期文学史意识，而这个意识的产生远早于欧洲和日本。

先看《文心雕龙》。《时序》篇毫无疑问，不仅涉及了文学史的意识，且作者以史的眼光，运用具体文字，系统地缕述了自上古迄南朝宋、齐历代——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、秦、两汉、魏、晋、宋、齐的文学，包括每个朝代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，其中以《诗经》、楚辞、汉武帝时期文学为重点，完全可称为一篇简明扼要、重点突出、观点鲜明的文学史——只是描述与评判的文字较为简略而已。而且，在依历史顺序阐述的基础上，作者特别提出了具有文学史意味的著名观点：“时运交移，质文代变”“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”，也即，文学的发展离不开“世情”与“时序”，这当中，包括政治条件、国家兴衰、时代风气、帝皇喜好、统治者文化政策、社会学术风尚等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时代与历史文化条件。可以说，整篇《时序》的阐发中，都贯穿了这个中心观点。应该看到，《时序》毫无疑问具备了文学史的意识，可谓文学史文本的最简略呈现。这还不够，如读者认真浏览《文心雕龙》全书会发现，除《时序》外，其实刘勰书中的论述，有多篇涉及了文体的阐发，这是它们分属于各种不同文体类型的表述——自《明诗》到《书记》，共二十篇，包括诗、乐府、赋、颂、赞、盟、铭、箴、碑、杂文、史传、论说等各种文体。这二十篇，分别阐述历代文坛所产生的各种文体，刘勰以历史发展的眼光，从文体分类的角度，作了具体细微的产生发展、各自特征及其代表作的阐述，这从今天的角度看，实际上就是分体文学史的雏形。此外，《才略》篇按时代顺序，分别述及各代重要作家，也包含了文学史意味。有学者或许会认为，从刘勰本人当时的写作初衷看，他是结合文学历史发展的过程，阐发各种文体的特征、创作手法及其代表作，以作为《文心雕龙》旨在创作指导的具微展示——这话不错，但客观上，这些分文体阐述的篇章，无疑铺展了分体文学史的轨迹，具有了文学史的成分，可以看作是文学史的雏形。

（据《光明日报》，有删节）

文史荟

投稿邮箱 hnrbyfb@sina.com